

反思与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

陈占彪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反思与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

陈占彪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②

内容简介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经过了从进化论、阶级观、政治标准、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理想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性等多种研究框架的错综衍变。以此为出发点,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以及文学现代性等若干重大问题,对“20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观等若干重要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的“当代形态论”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等若干重要现代批评理论思路,进行了整体性的学术反思与重构,这对深入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主要适用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可供普通高等院校人文学院、系的老师和研究生作为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 / 陈占彪
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305-05815-8

I. 反… II. 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58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
著 者 陈占彪
责任编辑 孙惠玉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8 字数 333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815-8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王铁仙

陈占彪这部书，我在数年前读过打印稿，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它视野开阔，取精用宏，颇多新见，且论述绵密，很有说服力。近日重新浏览一过，仍感新鲜，不觉过时，确实值得出版。

这本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重点是研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是很有难度的。作为“研究的研究”，有“双重”的研究对象，既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有全面地了解和深入地认识，又要具有较宽广的理论视野和较高的理论分析能力，才能把握相关的研究著作，进行科学的评论和判断。这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识见、文化修养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何况现在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数量极大，简直可说汗牛充栋，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的难度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特殊的学术背景。在中国，文学一直被视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中国的现代文学，形成于民族、国家危亡之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则更是时代大转折的精神产物，这使它有很强的现实性与社会性，甚至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需要有更广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知识和见解，要将它放置在一个比较大的学科框架中去观照，放置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现实场景中去思考，而不是就文学谈文学，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合乎理性，才可能有真知灼见。

而陈占彪，正有条件把握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做出成绩来。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感悟，又较早研究过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美学，这使他进入这个研究课题，能够抓住关键。另一方面，他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其他形态的文化以及与政治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一直重视把文学学科放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去把握。他既重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又注意其作

为一般意识形态的某些规律,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据我所知,陈占彪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几乎同时也在行政区划与行政区经济、文化产业、区域学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那方面的研究使他对包括经济、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有比较宽广和深入的认识。这是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缺乏的。陈占彪的这种较为特殊的学术经历,很有益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研究”,也形成了他基于一定思想个性的学术判断力。

如前所述,陈占彪的这部专著,重点论述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而比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著作,更多涉及前沿的、新颖的、重大的学术命题。其中有不少问题,至今还在辩论之中,尘埃尚未落定。但陈占彪针对其思想和学术焦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或明确其学术争论的症结所在,或揭示出研究者思想与行为之间的背离,或指出其批评理论面临的重构。比如,在有关新时期文学主体性、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学现代性等问题的学术反思中,陈占彪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论题还没有过时,还需要深入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主体性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掀起过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并不是要不要主体性的问题,而是个人主体性与群体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上,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难题,而是忽视了中国启蒙与救亡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关系重构中的特殊性;在文学现代化与反思现代性问题上,面对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体现出思想上的涵纳力量,但另一方面又进退失据,无所依凭,任意言说。陈占彪的这些见解是中肯的,深刻的。

在陈占彪这部专著出版之际,应他的要求,请我为他的书写序,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他能够沿着自己不断拓展开来的学术方向,做出更多成绩来。

2008年12月,上海

前言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30多年了,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这30年的学术历程做一考察,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是必需的,也是紧迫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辉煌!但到了21世纪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渐渐进入了“分化”阶段,不仅许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纷纷率先转向了文学的其他领域,而且甚至扩展到人文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等领域。这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危机”,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边界与视野的扩大,是一种学术转型。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之际,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些若干重大问题给予澄清与分析,对一些尚未尘埃落定的问题继续给予思考,对一些关乎未来学科学术发展方向的思想基础给予重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照着讲”或“接着讲”。

从学术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就像库恩所说的“范式”的转换,或是金岳霖所说“意念图案”的修改。如果说,“范式”或“图案”是浓缩和代表了某一时代的社会、国家、民族等文化的全部知识谱系的一种稳定性、内在深层的结构模式的话,那么,转型即意味着是从一种旧的“范式”或“图案”向另一种“范式”或“图案”的变化过程,即意味着新的对旧的结构模式的冲击。那么,新旧学术范式或意念图案的之间又是如何实现转型的呢?就其转型的动因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对外在的动力,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力量推动转型;另一种是学术自身内在相对独立的学术演进和逻辑展开推动转型,即学术自身转型。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更多的是相对外在的动力推动转型,从而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学术转型。

通过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考察,想达到三个方面的目的:

第一,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进行学术总结。一

方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加,学术成果可称得上汗牛充栋,这是历史的丰富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今天,其研究趋向已复杂多变,传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已由中心向半边缘甚至边缘退却。这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研究现象。所谓“两条腿”走路的研究现象,主要是指研究界纯文学和大文化研究两条思路并存,甚至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或在一个研究者身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有学者称之为“扩容”,有学者称之为“分化”,有学者则称之为“交叉”。这是站在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角度对同一事物和对象所做的表象上各异、本质上却相同的基本判断;但应当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的客观描述。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之际,总结已有学术成就,就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

第二,进一步清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1)直接参与了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受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影响很大;(2)与哲学、美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创作等联系密切,这种情况也决定了综合研究的心然性,诸如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广泛渗透;(3)突破时空思维界限,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比较研究中,寻绎其历史的踪迹和理论资源上的支持。但由于时代的、社会的、理论的、学科的、学术的等诸种原因,研究常一哄而上,研究成果普遍呈课题单一、结构雷同,多低水平重复,呈现缺乏独立的学术品格的“扁平”现象。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许多障碍。有些学者所谓的“新观点”看起来令人耳目一新,但从逻辑的和现实的角度经不住分析,甚至看起来截然相反的学术观点,实际上是用同一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只不过阐述的侧面不同而已。因而,从诸种研究现象背后看,清理其学术脉络,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真正深化和创新。

第三,从学科建设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以适应新的研究要求。中国现代文学从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之日起,就显示了其学术价值和文化生命力。仅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设置、名称演变、编撰主体、编写体例、结构安排、指导思想、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中,就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轨迹。

比如,许多学者曾直接发问:“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否应该取消?有时候,故意制造的“危机”和虚构幻想的“危机”从本质上是研究者自我生存价值感觉的“危机”,这不过是“作茧自缚”后渴望“破茧而出”,以获得自我价值感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求的自我表现而已。所以,从学科角度做此总结和反思势在必行。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多年以来,我一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另一边也从事着区域文化产业和区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说,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化”出来的一位研究者,也可算得上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发走得颇远的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这也许更有益于我能时时刻刻回头冷静地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问题,比别人可能更客观地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中的位置有更清醒地认识与定位。因此,这次修改主要是对基本的资料部分与相关评价做了大量删减,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学术转型为其理论框架,分别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思潮、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理论三方面的若干重要问题做专题考察,删减了部分资料性和论述性文字,侧重保留、修改和增强了“论”的部分。因此,本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论”,或许更恰当些!

当然,依然保留了“鲁迅研究”一节,踌躇犹豫之后,仍心有不合,实乃有点撇帚自珍;但“非鲁”及“非鲁派”、“非鲁史”等概括,恕我孤陋寡闻,还没见人这样很完整归纳过。其实,当初,论文答辩时就有学者提出过异议:一是从文学知识结构的系统性看,文学理论(思潮)、文学史、文学批评三部分本身就是完整的;二是从作家作品角度看,只列鲁迅一个人,别的作家怎么办。道理其实是对的,韦勒克就这样认为的;但反过来,我想选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构成文学知识系统的第四极,也是有例可循的。而且从“非”鲁的角度,既有宏观,也有微观,可补理论思辨之理性不足,多点感性和生动。

至于最后的附录,本是原稿第一章,大约5万多字,现把部分具体文献资料删除了,主要留下一些结论性的文字。我以为,这对那些初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或想了解海外与我国港台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的研究又怎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学人们,提供一点参考,也是很有益处的。另外,可惜的是,终因时间

原因,原想试图补足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料,一并出版。但发现文献资料量太大,要很有把握地完成还不知需多少时间,所以最终放弃了。这是要请大家海涵的,希望有兴趣和能力的同行将其整理出来,可能会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最后,我把本书第1—6章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

第1章——导论: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转型的内涵是包括过渡经济、政治超越、社会结构转型和两极中介哲学等具体构成;学术转型的内涵体现为从求实向求真、从以人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从通人到专家等方面的转型。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也必然具有转型的特征;从学术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必然具有转型的特征。因此,从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进行观照,就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求通目的,又有科学意义上的求真指向。进一步,从关系实在的角度出发,是求通与求真的内在统一。这是本书导论的核心部分。

第2章——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在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思潮)中,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以及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提出,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从理论上说,新时期以来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不断推进,文学主体性理论功不可没;但个体主体性却对与庸俗社会学相伴生的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缺乏深刻批判;同时,有关个体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以及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被引进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阐释,可视为文学主体性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进一步延伸。作为一个精简化了的思想模式,它本来是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模式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模式的逻辑推进,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引进“压倒”、“中断”说之后,它就必然像文学主体性“失落”说一样,成为残缺不全的叙述话语。文学现代性理论的提出,是从20世纪80年代“理想的现代化”到20世纪90年代“反思的现代性”研究框架的一次转移。由于理想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性概念本身包含着过程性和结构性特点,这使它具有与历史、现实乃

至未来相互勾连的特性；也正是这一点，使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涵纳和说明的力量。

第3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考察。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就文学史方面有“20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观的提出。今天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具体内涵，已经仅仅作为一种观点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它的种种不足亦有不少论者提出了批评；但其力图打通近代、现代、当代和新时期文学的目标都已变为现实，并且仍不断有人去响应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果“重写文学史”观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论在学术视野上加以调校，从更广义的“重写观”上有所发展，应该会有一些收获。不过恰恰相反，从“20世纪中国文学”论所引申出来的“重写文学史”观，却是对有学术价值的命题极端化，失去了普适性。这无疑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己的学术初衷。今天，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和学科建构，只有从文学史观和概念谱系两方面进行反思，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4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的演变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大体是一致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文化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既带来了发展机遇，又带来了严重创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大体经历了进化观、阶级观、政治观、思想观、审美观和文化观六大变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的“当代形态论”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三极建构的基础上，已呼之欲出；但建构一个较具说服力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还必须遵循科学的逻辑法则和学术方法。同时，还必须要有成功的创造性实践，对当下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现象，给予有效阐释。在这一意义上，它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又是相通的。

第5章——鲁迅研究。鲁迅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其兴衰变化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指导思想的深刻变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所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文学史观念的提出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上的突破，都与鲁迅研究有着关系。在本章中，重点对鲁迅研究史上批评、否定、歪曲、攻击乃至诬蔑

等诸种“非鲁”现象,做了较为细致的历史描述,并对各种“非鲁”现象背后所体现出的观念差异和学术立场等做了深入分析。最后指出鲁迅研究的出路在于:(1)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鲁迅;(2)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走近鲁迅;(3)从学术转型的角度研究鲁迅。

第6章——结语:学术重估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趋向。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学术历程。在历史已经跨过21世纪门槛的时候,回首凝视一下这曾经充满了研究者生命和心血的学术园地,是很有必要的。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的演变看,经过了进化论、阶级观、政治标准、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理想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性标准等多种研究框架的错综衍变。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学术重估,指出其贡献和不足。同时,重点从学科结构的现代调整 and 传统文学本体观变革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分化”现象,表达了看法。

陈占彪

目 录

1 导论: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001)
1.1 何谓学术转型	(001)
1.2 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	(007)
1.3 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	(015)
1.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	(021)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若干问题	(026)
2.1 新时期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学术考察	(026)
2.1.1 缘起:“文学主体性”大讨论的思想背景与争论焦点	(026)
2.1.2 本质: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性之争	(030)
2.1.3 辨析:从动物性、人性到主体性的哲学追问	(036)
2.2 重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	(041)
2.2.1 由“双重变奏”与“失落与回归”引起的一场思想争论	(041)
2.2.2 有关“双重变奏”说的几种批评意见及其主要逻辑缺陷	(046)
2.2.3 关于“双重变奏”说的思想局限与理论重构	(052)
2.2.4 “失落与回归”说的历史迷误与现实途径	(055)
2.3 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057)
2.3.1 “近代性”还是“现代性”:讨论缘起与主要观点	(058)
2.3.2 从“理想的现代化”到“反思的现代性”	(063)
2.3.3 有关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逻辑起点与思想内涵	(070)
2.3.4 余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审美现代性差异	(075)
3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考察	(077)
3.1 “20 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反思与实践	(077)
3.1.1 “20 世纪中国文学”论的提出与内涵	(077)
3.1.2 有关“20 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四种批评观	(082)
3.1.3 关于对“20 世纪中国文学”论四种批评观的学术辨析	(090)
3.1.4 两部“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编著实践与比较评价	(097)

3.2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透视	(102)
3.2.1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发起与形成	(102)
3.2.2 “重写文学史”的史观理念、重点、目的与原则	(106)
3.2.3 关于对重写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理论缺陷的反思	(112)
3.2.4 重写案例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原著本与修订本比较	(116)
3.2.5 重写案例 2:两部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比较评价	(120)
3.3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与学科建构	(125)
3.3.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状况与存在问题	(125)
3.3.2 “近代”“新”“现代”“当代”“新时期”概念谱系之流变	(128)
3.3.3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概念的谱系重构与命名	(134)
3.3.4 从共识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趋向	(139)
4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140)
4.1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流变特征	(140)
4.1.1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	(140)
4.1.2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特征与基本格局	(142)
4.1.3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的运演流变	(148)
4.2 新时期文学批评“热点”扫描与问题分析	(155)
4.2.1 新时期文学批评热点形成的思想背景与主要内容	(156)
4.2.2 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四种类型与基本特征	(164)
4.2.3 新时期文学批评状况的基本评价与总体思考	(170)
4.3 重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思考	(174)
4.3.1 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形成的三大传统	(174)
4.3.2 从哲学思维方式重构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180)
4.3.3 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转型的三大主要思想路径	(187)
4.3.4 关于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三个理论化特征	(194)
5 鲁迅研究	(196)
5.1 “非鲁史”的历史描述	(196)
5.1.1 建国前“非鲁派”的三种类型及其评析	(196)
5.1.2 新时期“非鲁”的原因分析与过程简描	(203)
5.2 鲁迅研究的问题分析与出路	(208)
5.2.1 “非鲁史”上的七种代表性观点及简析	(208)

5.2.2 从研究框架演变看鲁迅研究的基本出路	(213)
6 结语:学术重估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趋向	(221)
6.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的五次变迁	(221)
6.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学术脉络	(226)
6.3 从学科结构调整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位置	(231)
6.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趋向	(238)
7 附录: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变迁(1976—2001年)	(242)
7.1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谱系与学术历程的描述框架	(242)
7.2 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简要特点	(244)
7.3 前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245)
7.4 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247)
7.5 从海外“汉学”到海外“现代中国学”	(254)
7.6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257)
7.7 海外与我国港台地区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影响	(260)
7.8 我国对海外与我国港台地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译介与评价	(263)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69)

1 导论：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学术传统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最早的“概论体”学术史之作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等的创构，到清末民初乃至1930年代^①以“学案体”为主的学术史之作如余炳文的《儒史略》、黄嗣东的《道学渊源录》、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徐世昌的《清儒学案》等的终结，其间经历了一千六七百年的学术历程。纵观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千年运演流变，“其发展变化可以概括为：兴起于战国后期社会变革之际，形成于汉代儒学独尊之时，发展于宋明理学一统之世，全盛于清代两次经世致用思潮高涨之间，衰落于清末民初学术文化新旧转型之秋”^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既收获了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这种传统的以学案体为主的集大成的经典之作，也产生了如梁启超所撰的《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即《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钱穆分别撰写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这种近代以章节体为主的开创新风气的鸿篇巨制。

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反映，我国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正是中国在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条件下实现的。所以，每当整个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时候，就会有学者站在学术流变的河床上，对其加以清理、疏浚，使其学脉不断、学理通畅；每当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陷入有序的滞胀和无序的困顿时，也会有学者站在该学科的前沿反思，加以批判和总结，从而使该学科学术研究循序渐进、健康发展。

1.1 何谓学术转型

钱穆曾说：“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

① 为使本书“世纪、年、年代”的表示尽量统一，又要尽量遵循原文，现对正文作如下调整：（1）若在书名、丛书名、文章名及古文中出现，则保留原文；（2）如在其他处出现，则：①引文中——汉数统一为阿数；②引文外——“年代”前加“19”，其他同“引文中”。如“八十年代”于引文外统一为“1980年代”，而于引文中统一为“80年代”。——责任编辑注

② 卢钟锋. 中国传统学术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4

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消云散。”^①李慎之也以为,“一般来说,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以至命运,自然以政治、经济、社会为主,但是要分析到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那就非从学术的出发点研究不可。”^②刘梦溪更以为,“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③确实,学术在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可以为文化发展确定基本方向,它能揭示文化深层的思维模式和最隐秘的心理结构,它是文化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般公认,最早对“学术”一词做明确分疏的是梁启超。他在1911年所写的《学与术》一文中说:“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梁启超还就学与术二者之关系及我国传统学术之弊端进一步加以申述:“由此言之,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他批评“我国之弊,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弊,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帖括之学,白首矻矻,而丝毫不能为世用也;离学言术,故有如今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朝颁一章程,暮设一局所,曾不知其所应用者为何原则,徒治丝而棼之也”。梁启超还由“学”与“术”之区别与联系引申到对治学者与操术者之差异的分辨:“夫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宜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④自梁启超对“学”与“术”作有如此清澈透明的界分之后,基本上成为大家的共识。当然,梁启超之前后,如章太炎、蔡元培、蔡尚思、张岱年、曹聚仁等许多著名学者就“学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到见解,但他们就“学”与“术”之概念分疏上,此前者未如梁氏之说清楚明白,此后

① 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序. 见:钱穆纪念文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10

② 李慎之.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开放时代,1998(5)

③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 见:刘梦溪. 梁启超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

④ 同上,第723-724页。

者对梁氏之说也少持异议。

然而,如果认同梁启超的“学”与“术”的概念的分疏,那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又很难找出与此相等的概念和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纯粹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内容。严复曾这样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这大体透露出一些信息,即“学与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体相当于“知与行”、“心术”、“道术”、“格物致知”等,它们的根本点都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打转。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据张岱年说:“宋代朱熹与陆九渊曾经争论‘为学之方’。陆氏《语录》云:‘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①王夫之分“格物”与“致知”为二事,他认为,“格物”以学问为主,“致知”以思辨为主;颜元把“格”释为“搏斗”之意,意即要获得知识,必须从实践中来。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大体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即“道问学”大概与“尊德性”有关;但无论是有“道问学”后才能“尊道性”,还是先“尊德性”才能“道问学”,都知道学问是在“德性”的范畴内。可见,中学是求善之学,一向从“应然”出发。

从西方文化看,“学术”的解释大体相当于“科学”与“技术”。一般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认识、理解自然,回答的“是什么”、“为什么”的理论问题;技术的目的则在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解决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科学的特点是探索性活动、主要面对未知世界,有一定的意外性和偶然性,目标难于明确,自由性较强,多间接协作,个体性较强,是从实践到理论,追求精确完善的概念、公式、定理,多在“纯粹”的状态下进行;技术的特点则总是为了一定需要,在一定的科学原理指导下进行,目标明确,计划性较强,多直接协作,集体性较强,是从理论到实践,经验是技术中重要组成部分,多在考虑广泛、复杂的诸多因素中进行。^②这和梁启超对“学”与“术”的概念界分基本相同。所以,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是有技术而无科学的。这大体是对的。实际上,梁启超于1902年即开始介绍培根和笛卡尔的学说,对“学”与“术”的分疏本身就是以西方的“科学”观念为参照的。由此可知,西学是求真之学,一向从“实然”出发。正如李慎之所说,中学与西学“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三千年。随着鸦片战争

①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37-239

② 林超然. 现代科学哲学教程.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8: 497